

人大国发院十大核心产品系列

政 策 简 报

2018年12月 第21期 总第47期

中国贸易 40 年：现状、前瞻及建议

刘青



—— 中国人民大学 ——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UC

人大国发院简介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国发院）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独立的校级核心智库。国发院以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优势学科为依托，以项目为纽带，以新型研究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和公共交流平台为载体，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对中国面临的各类重大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进行深度研究。

作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人大国发院坚守“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的目标，着眼于思想创新和全球未来，致力于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进步。

国发院通过学术委员会和院务会分别对重大学术和行政事务做出决策。目前由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担任院长。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崇德西楼8楼

网站：<http://NADS.ruc.edu.cn>



人大国发院微信

作者简介

刘青，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分别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投资、跨国并购、企业创新、中国经济。兼任全国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青年论坛副秘书长、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经济研究》等国际国内主流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项，多次应邀参与中办、商务部、中宣部、国务院参事室等部门座谈会，多次为统战部、商务部提供培训，多次接受央视（《新闻联播》、《晚间新闻》、《24小时》、《朝闻天下》、《新闻直播间》等）采访，并在人民网、人民论坛、人民法治、财新等发表文章。刘青教授关于中国海外并购的论文曾获得国际商务领域权威学术组织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IB) 2015年最佳论文奖，关于全球化与企业创新的论文获得中国经贸领域最高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欢迎媒体摘发、转载或采访。

媒体热线：程建平； 办公电话：010-62625159 15601321015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

主编：聂辉华

编辑部主任：邹静娴

本期责编：邹静娴 程建平

摘要

四十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上取得无与伦比的成绩，对此毋庸赘言。但我国需要警惕可能已经显现的后劲不足问题，尤其是在国际竞争激烈的中、高科技产品领域。我国当前阶段没有“出口过度”，相反是“出口不足”，我国贸易模式事实上已经演变为“小进中出”型，需要提防日益“体内循环”或“内卷化”的趋势。未来我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进一步凸显，我国的发展需要有更高的国际包容性。扩大进口有诸多益处，但若不能同时完善我国市场制度，进口竞争效应与进口替代效应很可能削弱我国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而从长远损害我国经济竞争力。动态来看，我国未来的贸易前景，关键取决于我国传统产业与高端产业之间一退一进的速度竞赛。在高科技产业上，最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是市场制度质量，我国贸易强国之路的根本在于提升涉及市场活动的关键制度质量，打造“新时代的新改革红利”。传统产业的转移上切忌人为、过快打乱产业链，需要循序渐进，国内转移为主、国际转移为辅，人口流动为主、产业流动为辅。

在我国经济近四十年的成功发展中，国际贸易被公认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关键阶段，维持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紧迫议题；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也取得了历史性成绩，出口占国际市场的份额达到半个世纪以来单个国家的最高记录，同时围绕我国的贸易争议也不曾停止甚至愈演愈烈，这些争议必然会对我国未来出口增长及相关政策导向带来影响。在未来实现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国际贸易的作用依然至关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演讲中所言，“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我们首先对我国国际贸易经过 40 年大发展之后的现状进行分析，厘清几个基本事实，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贸易未来发展进行前瞻性分析，为其他进一步的判断提供参考，并对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的转移提出建议。我国经济与贸易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毋庸赘言，本文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尽量聚焦于相关问题以探讨进一步发展、改善的对策。

在分析我国贸易时，我们同时对比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美国 and 德国、以及亚洲发达国家的代表日本和韩国，以资借鉴。在国际贸易视角下，美国、日本代表了一种模式，而德国、韩国则代表了另一种模式。

总结而言，本文提出以下关于我国贸易的十点见解。

(1) 四十年来我国出口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绩，但要警惕可能已经显现的后劲不足问题，尤其是在中、高科技产品领域，我国的出

口占比相对于我国 GDP 占比自 2006 年以来已持续下滑。

(2) 我国当前阶段没有“出口过度”，相反是“出口不足”，仍需努力发展出口；中国贸易模式事实上已经演变为“小进中出”型，需要提防日益“体内循环”或“内卷化”的趋势；相反，德韩等国的贸易模式才是“大进大出”型。

(3) 我国出口造成的贸易争议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于我国进口相对不足，而非出口过度，中美之间的贸易尤其存在进口不足问题。

(4) 金融危机之后，从贸易角度而言，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可能已经发生系统性变化，未来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5) 在基准情形下，未来我国出口的世界占比很可能进一步攀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进一步凸显，为缓解可能进一步加剧或者扩散的国际摩擦，我国的发展需要有更高的国际包容性。

(6) 动态来看，我国未来的贸易前景，关键取决于我国传统产业与高端产业之间一退一进的速度竞赛。

(7) 扩大进口可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包容性、短期内缓解贸易不平衡，但若不能同时完善我国市场制度，进口竞争效应与进口替代效应很可能削弱我国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而从长远损害我国经济竞争力以及未来出口。

(8) 高科技产业最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是市场制度质量，我国贸易强国之路的根本在于提升涉及市场活动的关键制度质量。简洁而言，在于“强制度、扩开放、促竞争”。

(9) 法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建议实施一项专项经济法

治行动，在 2020 年前全面大幅提升涉及市场活动的几项关键制度水平，形成“新时代的新改革红利”。

(10) 传统产业的转移切忌人为、过快打乱产业链，需要循序渐进，国内转移为主、国际转移为辅，人口流动为主、产业流动为辅。

一、我国出口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绩，但要警惕可能已经显现的后劲不足问题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1992 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尤其是 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我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简称出口占比）持续增长，几乎从未出现过下滑（见图 1）。2009 年我国出口占比达到 9.57%，超越德国的 8.92% 与美国的 8.41%，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5 年，我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达到顶峰的 13.79%，这是自 1968 年以后单个国家出口占比的最高记录。我国出口取得了辉煌成绩，在此过程中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我国出口占比出现下滑，达到 13.15%，2017 年进一步下滑到 12.78%。虽然只是轻微下滑，但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自 2012 年以后，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占比却一改此前持续下滑的态势，呈现趋势性的增长，韩国的出口占比也基本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这些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不可能来自传统制造业部门，必然来自高端制造业或者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这可能意味着这些工业化国家在高端制造业上的各种政策已经取得进展（比如，美国 2010 年启动的“再工业化”战略、德国 2013 年正式推出“工

业 4.0” 战略等；数据亦表明美国近十年在资源型产品及初级产品市场上出口上升）。两相对比，意味着我们对我国出口占比的下滑不能掉以轻心，对我国未来高端制造业所面临的竞争态势需要保持警惕，而高端制造业正是我国未来出口提升的关键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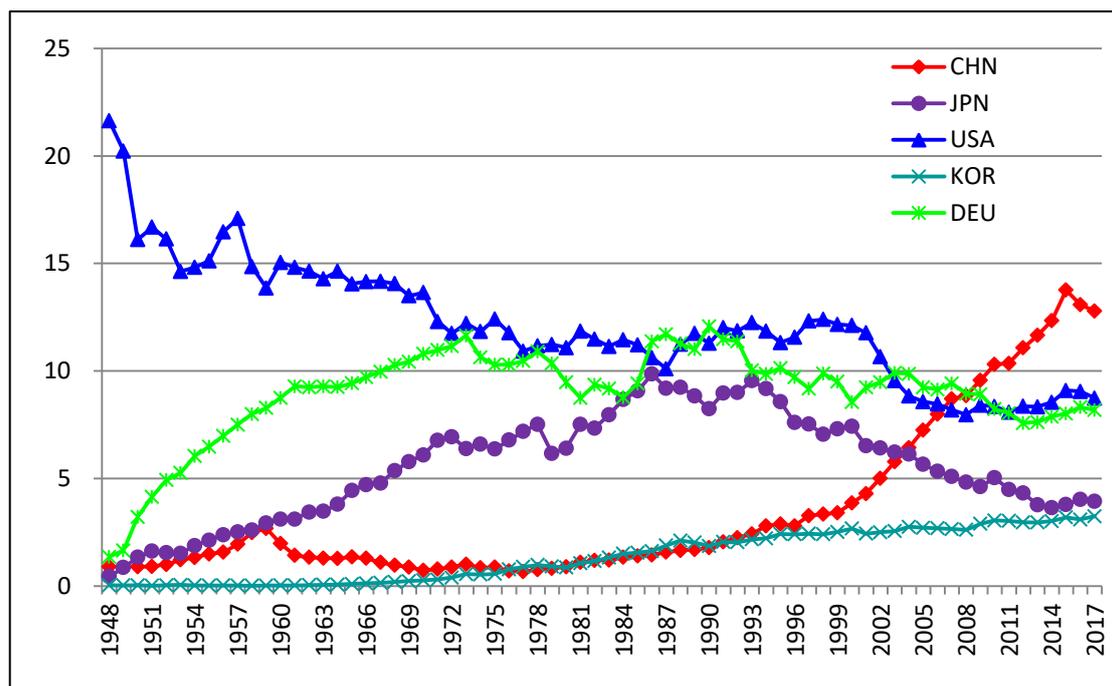


图 1. 各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 (出口占比)

二、我国没有“出口过度”，相反是“出口不足”，未来出口占比很可能进一步提升

由于我国出口取得的巨大成绩、以及巨大的出口量对其他国家造成的种种冲击，各界逐步形成了我国“出口过多”、“出口过度”的印象。这对我国出口政策决策的导向与国际交往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是，深入的数据分析表明，我国没有“出口过度”，相反，我

国当前“出口不足”。

第一，从出口依存度（出口占 GDP 比重）来分析，我们发现自 2011 年之后，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已连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 2）。事实上，自 2006 年我国出口依存度达到峰值 34.93% 之后，便持续下降，直至达到 2017 年的 18.84%，远远低于同年德国的 39.39%、韩国的 37.30%，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2.01%。这表明，自 2006 年之后我国经济已经逐步转向依赖内需。另一方面，在出口依存度上，在整个 1980-2017 期间的所有年份（只有 1994 年除外），德国或韩国都高于我国；相反，美国、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则一直相对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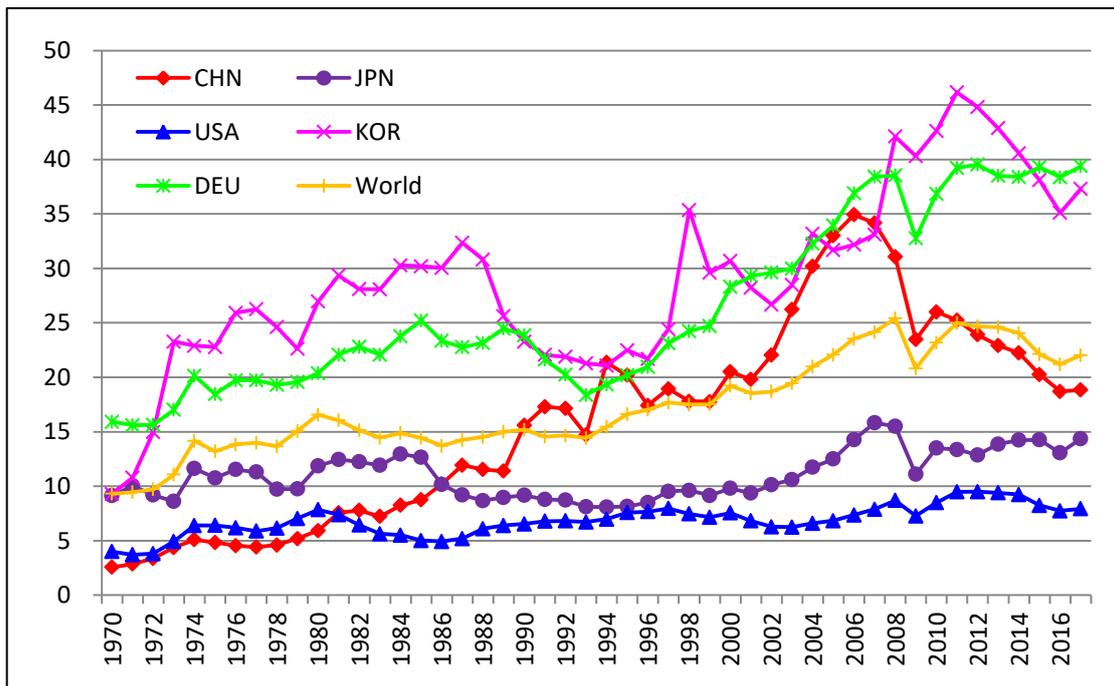


图 2. 各国出口占 GDP 的比例（出口依存度）

第二，相对于我国 GDP 规模来看，我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不足。衡量我国出口占比的高低，需要考虑我国的经济规模，即我

国 GDP 占世界总产出的份额（GDP 占比）。我们发现，自 2011 年以来，我国出口占比持续低于我国的 GDP 占比（见图 3），这表明，相对于我国的经济规模，我国出口不足。与出口依存度的模式类似，我国出口占比/GDP 占比自 2005 年以来持续下降。而德国、韩国，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其出口则不成比例地过多（出口占比/GDP 占比大于 1）；美国、日本则是不成比例地过少（出口占比/GDP 占比小于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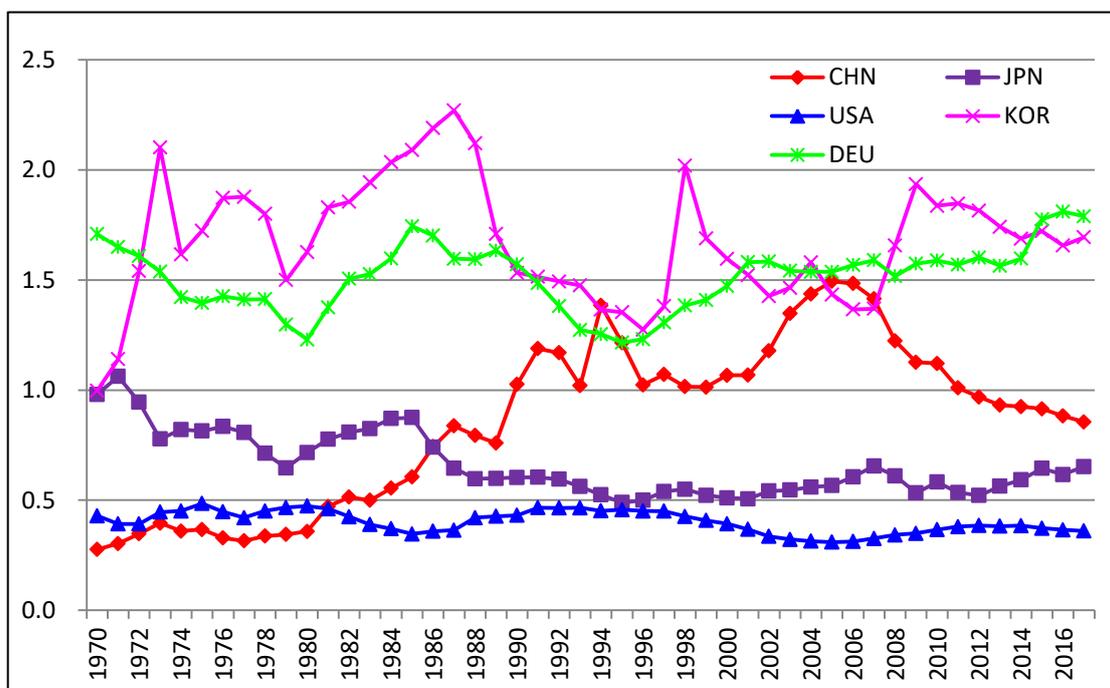


图 3. 各国出口占比/各国 GDP 占比

(注:出口占比指各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GDP 占比指各国 GDP 占世界总产值的份额)

特别地，如果我们进一步检视对我国现阶段发展具有特别意义的中、高科技产品领域的出口，我们发现（如图 4），相对于我国的 GDP 规模，我国在中、高技术产品领域的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

自 2006 年以来持续下降，直至 2016、2017 年刚好与我国的 GDP 占比持平。如果我们分别检视我国的高科技产品和中等科技产品出口，亦可发现类似模式。而近年来，德国、日本的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相对于其 GDP 占比持续增长，韩国也在 2017 年实现增长并始终保持很高比值，美国则基本维持稳定。这充分揭示了我国在中、高科技产品领域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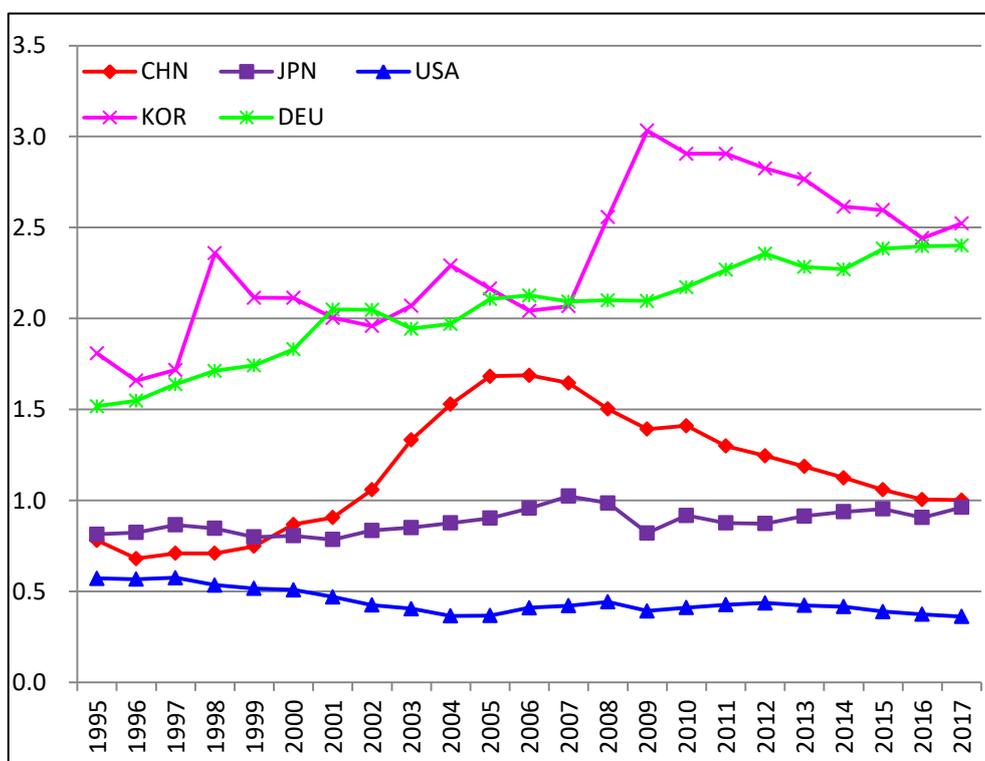


图 4. 各国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各国 GDP 占比

(注:出口占比指各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GDP 占比指各国 GDP 占世界总产值的份额)

总结而言，数据表明，我国出口有过一段繁荣时期（尤其是加入 WTO 之后的 2001-2011 年期间），但我国出口的现状表明，现阶段我国没有“出口过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出口不足；与未来

可资参照的德国、韩国相比，我国更是出口过少。这意味着，一方面，我国在出口政策决策的导向上，仍需努力促出口，加强国际经济交往，而非自我设限、逐步封闭；另一方面，我国未来出口占比仍有增长空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出口占比很可能继续攀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会进一步凸显，随之而来的国际摩擦很可能进一步加剧、扩散，我国对此需有所预判。为缓解可能进一步加剧或者扩散的国际摩擦，我国的发展需要有更高的国际包容性。

三、我国出口造成的贸易争议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于我国进口不足，而非出口过度；中美之间的贸易，尤其存在进口不足现象

一个相应的问题是，既然我国并没有出口过度，那为何会围绕着我国出口产生这么多贸易争议？背后的症结在于，相对于我国的出口而言，我国进口“太少”。

第一，相对于我国 GDP 规模来看，我国进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很低。我们发现，自 2008 年以来，我国进口占比持续低于我国的 GDP 占比（见图 5），这表明，相对于我国的经济规模，我国进口不足，且我国进口占比/GDP 占比自 2004 年以来持续下降，到 2016 年，我国进口占比只相当于我国 GDP 占比的 66%。而德国、韩国，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自 1980 年以来，其进口则不成比例地多（进口占比/GDP 占比大于 1）；美国、日本则是不成比例地过少（进口占比/GDP 占比小于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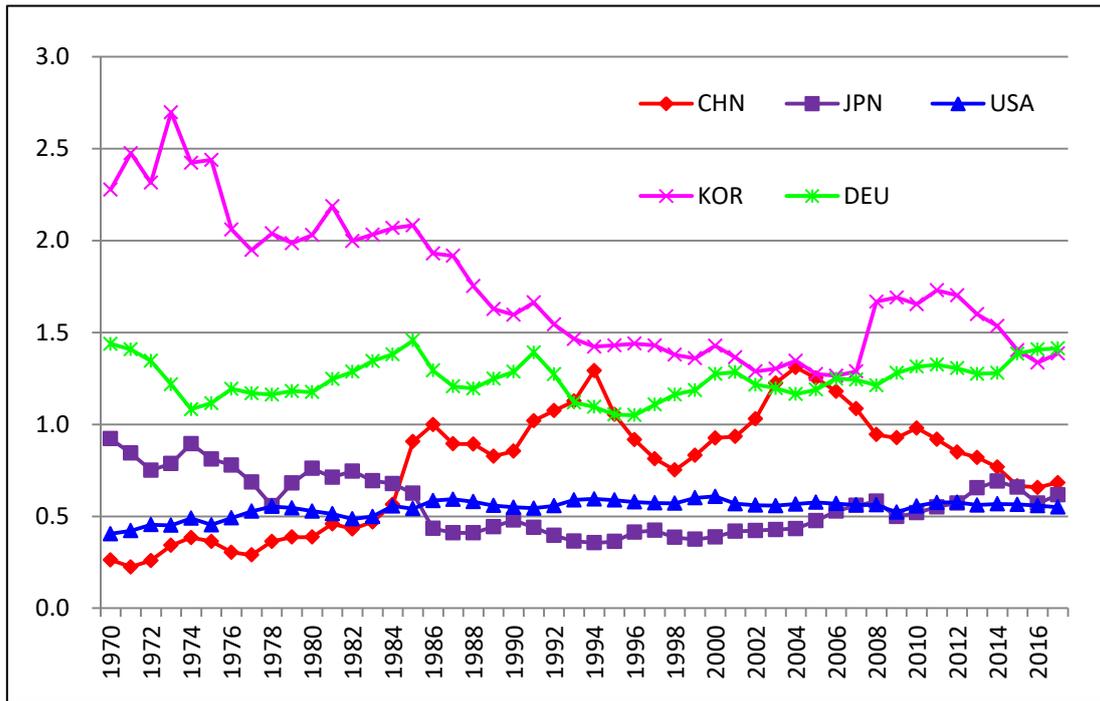


图 5. 各国进口占比/各国 GDP 占比

(注:进口占比指各国进口占世界总进口的份额;GDP 占比指各国 GDP 占世界总产值的份额)

第二，对比我国的出口占比与进口占比（见图 6），我们发现，我国的确进口“太少”。2015 年，我国进口占比相对于其出口占比是最低的，进口占比约为出口占比的 73%，即中国贡献的世界市场份额为中国占领的世界市场份额的 73%。这一比例与德国、韩国较为接近。对比鲜明的是美国，自 1970 年代以来，美国贡献的世界市场份额均高于其占领的世界市场份额，在近年其贡献的世界市场份额约为其占领的世界市场份额的 1.5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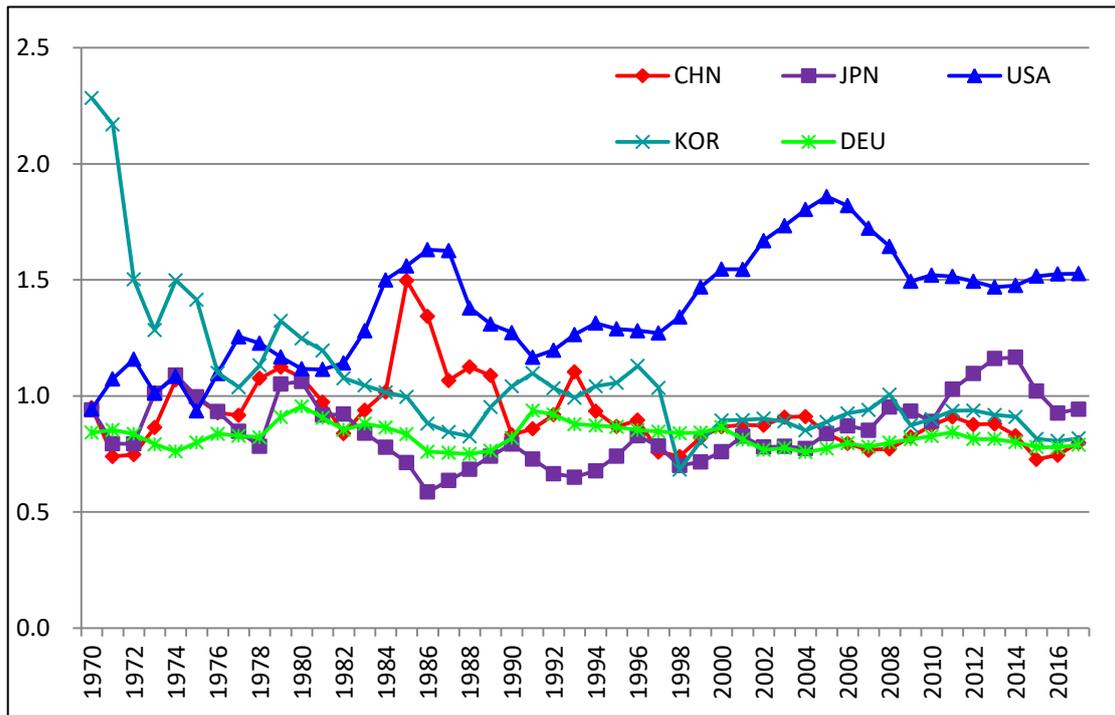


图6. 各国进口占比/各国出口占比

第三，中美贸易争议的直接来源之一，在于我国从美国的进口份额远小于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份额。图7表明，在中美双边贸易中，我国总出口中美国贡献的市场份额，远远高于我国总进口中美国得到的份额（ $\frac{\text{我国对美国的出口}/\text{我国总出口}}{\text{我国从美国的进口}/\text{我国总进口}} > 1$ ）。这一模式与中德、中日、中韩之间的双边贸易形成鲜明对比（ $\frac{\text{我国对各国的出口}/\text{我国总出口}}{\text{我国从各国的进口}/\text{我国总进口}} <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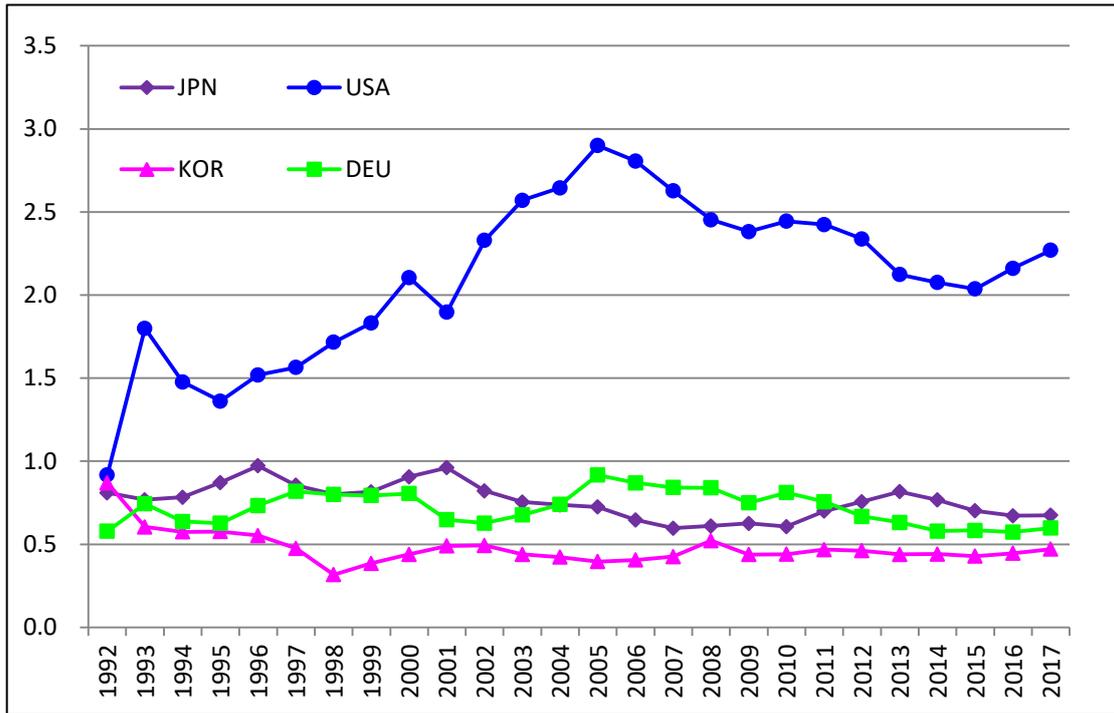


图 7. $\frac{\text{我国对各国的出口}/\text{我国总出口}}{\text{我国从各国的进口}/\text{我国总进口}}$: 中美贸易争议之直接原因之一?

由于贸易争议日益影响到我国的出口环境，我们的分析表明，在促进出口的过程中，我国要注意进口平衡，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更是如此。我国进口不足，尤其是我国从美国进口不足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中美国在中国进口量最大的集成电路与石油领域的出口管制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美国在 2016 年解除原油出口管制，我国在 2017 年即成为美国第二大原油出口目的地）。

另外，综合对各国出口与进口进行的分析（见图 3、图 5），我们可以发现，相对于各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例，各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存在以下模式：德国、韩国为“大进大出”型；美国、日本为“小进小出”型；我国则可称之为“小进中出”型，我国与外部的经济交往有待加强。需特别警惕的是，从 2005 年开始，

以相对 GDP 规模的指标来度量，我国出口、进口均表现出迅速缩减的趋势，这有可能是我国整体经济向美国、日本模式演变的信号，值得高度关注。这种演变背后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一种可能性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向内需、建立完整产业链的努力取得进展；一种可能性是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结果，2005 年这个时间节点与房地产热的兴起高度吻合，逐步蔓延到全国的房地产热推高了企业成本、削弱了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另一种可能性是由于 2005 年人民币的升值（但同期我国进口亦持续下降，所以这种原因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至少不是唯一主要原因）。总而言之，我国需要特别提防经济日益“体内循环”或者“内卷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与外部的经济交往。

四、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与经济发展模式，可能已经发生系统性变化

在分析我国未来出口前景时，需要注意到，全球的贸易与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后可能已经发生系统性改变，即各国都更少依赖国际市场、更多依赖内需来发展经济。从图 2 可以发现，2011 年之后，各国（包括我国）的出口依存度都在下降，世界平均的出口依存度也是如此。如果这一转变的确已经系统性地发生，那么可以预见，未来国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我国未来的出口增长除将面临中美贸易摩擦的挑战之外，还将面临国际经济发展模式大环境变迁的挑战。我国对此需有所研判与准备。

五、2021 年我国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的预测：随着我国

经济增长，我国贸易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凸显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第一个一百年”时期（即2021年）我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进行简单预测。由于我国当前出口的比较优势来源于传统制造业，而我国经济正在努力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我们预测未来出口占比需要考虑我国未来的经济结构（即传统制造业与高端制造业之比）。我们考虑两种基本情形。

第一，基准情形：短期内假设我国传统制造业与高端制造业保持目前结构

假定我国及国际贸易政策不发生根本变化，短期内我国产业结构不发生大幅变化，在此基准情形下，一方面，我国未来的出口占比取决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我们分别考虑三种可能性：我国经济每年保持6%增长率，世界经济保持2%增长率；我国经济每年保持6.5%增长率，世界经济保持3%增长率；我国经济每年保持7%增长率，世界经济保持3%增长率。

另一方面，我国未来的出口占比取决于我国以及全球贸易模式。我们分别考虑四种情形：我国基本维持目前模式；我国出口向德国、韩国模式演变；我国出口向美国、日本模式演变；全球贸易模式系统性转变为金融危机之后的模式。

在组合形成的12种可能性下，我们通过线性拟合发现，在不考虑贸易政策变化及我国未来几年产业结构发生大幅变动可能性的基准情形下，我国2021年的出口占比预计处于14.99%-16.70%之间（见表1）。当我国经济保持6%增长率、世界经济保持2%增长率、且我

国出口向德韩模式逐渐演变时,2021年我国出口占比将达到16.70%。当我国经济保持6.5%增长率、世界经济保持3%增长率、且全球贸易模式系统性转变为金融危机之后的模式时,2021年我国出口占比将达到14.99%。这意味着,在基准情形下,相比于目前,我国出口对世界的经济影响会进一步凸显,我国经济与政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更广泛的反应,我国与他国的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我们对此应有所预判,在构思与落实我国发展战略时需要有更高的国际包容性,比如目前的扩大进口、“一带一路”倡议等。

表 1. 不同情形下 2021 年我国出口占比预测

不同的经济增长前景		不同的贸易模式			
我国经济 增长率	世界经济 增长率	基本维持 目前模式	向德韩 模式演变	向美日 模式演变	全球转向金融 危机后模式
6%	2%	15.65%	16.70%	15.69%	15.21%
6.5%	3%	15.36%	16.25%	15.40%	14.99%
7%	3%	15.63%	16.67%	15.67%	15.19%

第二，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坏的情形

我国未来的世界出口占比，可能比上述基准预测更好或者更坏，这取决于我国传统制造业退出速度与高端制造业崛起速度之间的赛跑，以及我国贸易政策与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

产业赛跑的结果存在两种可能。（一）如果未来几年我国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得以保持或者产业转移以适当速度渐进实现，而高端制

制造业的发展取得进展，那么我国 2021 年出口占比会高于上述基准预测。但我国高端制造业迅速取得实质性进展面临着两个相关问题，一是内部问题，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够完善；二是外部问题，美德日韩等工业化国家在高端制造业上已经取得进展（见图 1），我国面临的竞争压力会逐步加剧。如下所述，我国需要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做出更大努力。（二）如果未来几年我国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迅速丧失或者因政策原因导致传统产业过快转移到国外，而高端制造业发展缓慢，那么我国 2021 年出口占比会低于上述基准预测。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给定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约束，传统产业的退出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下所述，我国在传统产业发展上需要把握好梯次衔接、渐进转移的原则。

我国贸易政策与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也将影响我国未来的出口占比。如果我国的出口政策发生大幅度保守性变化，我国出口必定受到负面影响，在我国目前“小进中出”型的贸易局面下这一点需要竭力避免。我国国际贸易环境面临的最大变数是中美贸易冲突。冲突带来的不仅仅是关税本身，还有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二者均会影响我国出口，而后者的影响将更加深远。多种测算表明，短期内，我国出口受到的关税直接影响应该可控。但我们更应该密切关注在我国本身的产业链以及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是否会受到贸易冲突的明显冲击，这种冲击可能对我国未来出口造成更实质性影响。

当然，我国未来的出口占比也会受到我国及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变化的影响。如果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我国的出口占比也会下降。

考虑到我国未来贸易从根本上取决于高端制造业与传统产业的发展，我们分别对这两类产业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需要高质量的市场制度支撑

我国贸易被普遍认为大而不强，具体表现和原因，最核心的共识有两点：一，表现在于我国出口主要是中低端产品，在高端行业缺乏竞争力；二，原因在于我国企业创新不足，创新不足是由于市场竞争不足、开放不够，而市场竞争与开放与我国进口政策直接相关。我们认为，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需要高质量的市场制度支撑，尤其是在当前扩大进口的情况下，更需要加速提升我国的市场制度质量，否则可能从长远损害我国出口竞争力。

第一，高质量市场制度是高端产业比较优势的最重要来源。

过去40年，我国贸易大国地位的建立，主要依靠的是传统要素、资源禀赋所带来的比较优势。要发展高科技产业、高端制造业，就必须超越传统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建立基于市场制度质量的新比较优势，尤其是要注重契约执行与产权、知识产权的保护。世界各国的发展经历，已充分证实这一新比较优势对于高端产业的重要性。事实上，市场制度质量是现代国际贸易中高端产业比较优势的最重要来源，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禀赋的重要性的总和。这是因为，高端产业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它比传统产业更依赖于市场制度质量。一方面，越是高端的行业，涉及到的产业内、产业间分工越是细密、复杂，产业链越长，从而越是需要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公平、公正、

有力的契约执行，是促进企业之间协作的根本保障。另一方面，越是高端的行业，知识和研发越密集，企业之间进行知识交流的要求越高、中间产品的专用性越强且定价越模糊（无明确的市场参考价）从而越容易产生市场争议，这也要求有高质量的财产权利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第二，高质量市场制度是实现“以竞争促创新”的前提条件，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创新反而更可能意味着死亡，因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企业财务状况必然相对脆弱，而创新需要高额投入、承担巨大风险，稍有闪失即意味着在激烈竞争中被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企业不能充分享受创新带来的潜在知识产权收益，则企业更不会从事创新冒险。因此，当我们在推出各种竞争机制、意图以竞争促创新时，必须结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加强，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否则将适得其反。这一点在我国当前扩大进口的背景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第三，高质量市场制度是实现“以开放促创新”的前提条件，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降低中间品与资本品进口关税以促进外国技术转移与本土企业自主创新，需要高质量市场制度护航。一方面，降低进口关税，企业会增加中间品（包括仪器设备等资本品、技术产品）的进口或者提高进口部件的质量。通过吸收进口中间品中隐含的国外先进技术，我国企业可降低创新的成本从而增加自主创新。然而，

另一方面，由于扩大开放导致获取进口中间品、技术产品的成本降低，企业也可能采取“拿来主义”、放弃自主创新，更多地依赖于外部产品、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够时，企业创新的收益无法得到保证，企业会更多倾向于“拿来主义”，以进口来替代自主创新。因此，以开放促创新，也必须结合知识产权制度的加强，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以竞争促创新”、“以开放促创新”这两点在我国当前扩大进口的背景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扩大进口可以提升我国消费者福利，降低企业成本，缓解贸易不平衡，增加我国发展的国际包容性，具有众多益处。但是，在扩大进口的同时，需要注意辅以迅速提升我国产权与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否则可能由于扩大进口所带来的竞争加剧、以进口替代自主创新等效应而削弱企业创新活动，从而从长远损害我国经济竞争力与出口。

第四，经济政策、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创新的重要阻碍。

相比较于政府的经济政策而言，完善的市场制度、经济法治可以给企业较为稳定的经济预期，而经济政策则通常较为易变和不可预期。经济政策、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会显著阻碍企业创新。由于创新通常需要较大投入，而这类投入一般是不可逆的，即创新过程中的各种投资不可变现，因此，当企业对未来的市场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时，企业会推迟甚至放弃创新。这就意味着，就促进创新而言，我国在治理经济时，需要尽可能以完善的经济制度、法治来代替各种临时性的经济政策，从而降低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激励企业创新。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我国需要以市场制度质量建设为重点创造“新时代的新改革红利”，迅速、旗帜鲜明地加强市场制度质量建设、经济领域法治建设，这是培育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新比较优势、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的牛鼻子与最重要前提。同时，高质量的市场制度也是各种技术性措施实现预期目标的根本保障，没有高质量的市场制度，各种技术性措施很可能无功而返甚至适得其反。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第一，以实际行动稳妥推进经济领域制度与法治建设。制度与法治的完善是系统而艰巨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可以以经济领域相关的制度建设、法治建设为抓手、突破口，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实施一项专项的经济法治行动，以重点突破方式，加强经济契约公平公正执行的力度、加强正当财产权利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几项关键市场制度，力争在 2020 年之前，以实际行动大幅度提升我国涉及市场与经济活动的制度质量、法治水平。在具体实施上，举例而言，独立的知识产权法院（法庭）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方式，但全面、完善的方案需要经过法学界系统、严谨的研究。

第二，增强政策和制度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我国在治理经济时，需要尽可能以完善的经济制度、法治来代替各种临时性的经济政策，尽量减少以随意性较大、可预期性较低的经济政策来进行经济干预，从而降低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激励企业创新。

第三，加大宣传，改善预期。市场预期对经济走向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法治行动需要以旗帜鲜明的行动、同时配合以有力的宣

传来迅速提升市场制度质量预期、提振民间投资、引导经济发展的“自我实现”趋势，以有效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会。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政府的大力宣传往往被视为具有表达“承诺”、传递“信号”的作用，宣传的缺失往往会让实际的行动事倍功半。

总之，高科技产业、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是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我们建议在迅速提升关键市场制度质量的前提下，努力扩大开放、促进竞争。简洁而言，就在于“强制度、扩开放、促竞争”。这也符合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要加强全面依法治国、并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决策，坚定落实这些改革将创造我国“新时代的新改革红利”，我们有理由对我国在国际经济竞争新形势下取得新的突破保持乐观。而另一方面，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战略机遇期稍纵即逝，我国也绝不能错失。

七、传统制造业的转移，需要注意梯次衔接，切忌人为打乱产业链

我国完整、高效的产业链和产业结构，是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无论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还是传统制造业的发展，都需要从高附加值环节到低附加值环节全产业链的相互协作。任何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远离了产业链，其竞争力都会受到大幅影响。因此，在制定传统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时，要遵循市场规律，循序渐进，切忌轻易人为、过快打乱我国完整的产业链，保证传统产业在区域、行业上的梯次衔接、渐进转移，保证全产业链上的企业有足够的

时间调整、适应变化。具体地，第一，在传统产业的跨国转移问题上，由于我国存在显著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国内存在足够的区域间高低搭配、相互协作空间，要坚持国内转移为主，国际转移为辅。第二，在传统产业的国内转移问题上，要坚持人口流动为主，产业流动为辅，一是因为人口流动成本相对较低、流动性相对较高，二是有利于产业从中心区域到外围区域的渐进、梯次转移，降低产业链演化过程中的波动幅度。

八、总结

在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本文对我国贸易经过四十年发展之后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对“第一个一百年”时期（即2021年）我国的贸易进行了前瞻性预判，并相应地对决定我国未来经济与贸易发展的传统产业与高端产业的发展给出了建议。我们认为，四十年来我国出口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绩，但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要警惕可能已经显现的后劲不足问题。我国当前阶段没有“出口过度”，相反是“出口不足”，仍需努力发展出口；中国贸易模式已经演变为“小进中出”型，相反，德韩等国的贸易模式才是“大进大出”型。我国出口造成的贸易争议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于我国进口相对不足，而非出口过度，中美之间的贸易尤其存在进口不足问题。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与经济发展模式可能已经发生系统性变化，未来国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在基准情形下，未来我国出口的世界占比很可能进一步攀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进一步凸显，为缓解可能进一步加

剧或者扩散的国际摩擦，我国的发展需要有更高的国际包容性。动态来看，我国未来的贸易前景，关键取决于我国传统产业与高端产业之间一退一进的速度竞赛。扩大进口可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包容性、短期内缓解贸易不平衡，但若不能同时完善我国市场制度，进口竞争与进口替代很可能削弱我国的创新活动，进而从长远损害我国经济竞争力以及未来出口。高科技产业最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是市场制度质量，我国贸易强国之路的根本在于市场制度质量提升。我们建议实施一项经济法治行动，在 2020 年前全面大幅提升涉及市场活动的几项关键制度水平，形成“新时代的新改革红利”。传统产业的转移切忌人为、过快打乱产业链，需要循序渐进，国内转移为主、国际转移为辅，人口流动为主、产业流动为辅。

供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所有权利保留。任何机构或个人使用此文稿时，应当获得作者同意。如果您想了解人大国发院其它研究报告，请访问 <http://nads.ruc.edu.cn/more.php?cid=425>